

## 從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試窺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前途

### 並論與我固有文化精神的統合

樓 桐 孫

文化平流接萬方，真光遠射幾重洋。亦興人類安全感，航路時時對太陽。」

——于右任：台灣為自由民主之燈塔

#### 一、題旨答客問

——好一個大題目！從你這近四十個字的命題，我認為在你天真空洞的腦海中，似乎是要想抽引出你的三個經濟概念。第一是你對於「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由衷的支持，進而加以闡釋，期能順利進行，以安定人心而擋住在驚惶失措中可能釀成的經濟危局。其次，我知道你是虔信合作主義的老兵。你不想因利乘便，把握機宜，在國人一致擁護遵行「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的熱烈氣氛中，使合作運動在寶島重振旗鼓，以謀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獲得有力的帶動以奠定全面建設基礎而共享未來幸福生活的始基。末了，更進一步，你是不是企圖以合作思想為主導，建立起一種新的踏實的社會經濟體制以後，俾可慢慢地融滙並宏揚我們優越的本位文化精神，從而終於能有實現 國父所懸鵲的「世界大同」的一天？你這種想法，誰也不能有所非議。可是！自古以來，崇高的理想總不免會使人們發生一種迷漫感……

——謝謝！先生。您所指出我對本文的構想和人們可能發生的迷漫。

我不否認。這個題目確似近於誇大。以十分疏淺的我，居然想窺測這般久大的經濟遠景，自知必將有覆餗之虞，徒貽恥笑。不過大家知道，民國初年代，胡適極力提倡白話文和新詩，（當時似叫做「白話詩」）過人的勇氣使他樂於冒莫大的險。他把陸放翁「嘗試成功自古無」的一句詩，改為「自古成功在嘗試」。因為他是相信杜威博士（Dr. John Dewey）的實驗哲學的。他竟然冒着當時學界的「大不韙」，出版了一本「嘗試集」（或「嘗試」篇？）。我當時對他這種精神暗暗欽佩。我早年在巴黎為「東方雜誌」所寫的文章，雖然並不懂得真正所謂的「白話文」，但却顯有了這種傾向。（直到而今，我所寫時文仍然多是不「文」不「白」，自覺可笑！）我還記得他的幾句「白話詩」：「……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做事作詩應如此，雖未能成頗有志。……」因此，題目之大，並非是我「好大」，實在是由於「茲事體大！」大到事關 國父遺教所倡導而由憲法所定為「基本國策」的「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的

「合作事業」！所以定下這麼大的一個命題，雖然我明明自己知道必將會「麻雀吞豆」，「力不從心」，但也想「嘗試」。「嘗試」。想起來，你和讀者們也許會笑而領之的吧。他方，法國有一句諺語，加強了我這「嘗試」的決心。"Essayer, cest accepter."「嘗試就是接受」。是以後文所述，由於時間匆促，資料零零，文字上定多詞不達意或牽強附會的地方，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 二、先談對「措施方案」或有一些誤解

當行政院公布「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以後簡稱「措施方案」）時，我直覺的認為，並亦曾向好幾個朋友昌言：「這是自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六十餘年間唯一的一件明確、精到而又強力易行的最重大的經濟憲事」（Economic Charter）！明確。它言簡意賅，沒有「公文書」的晦澀老套，易為大眾所瞭解。精到。大概是由於事先經過周詳慎重的考慮和研議，它對於財政收支、通貨發行、金融、利率、稅率、國營事業、對外貿易及農、工、商各業的情況如議價、禁建等等，都有一番縝密的配合。更可讚美的是對於消費者大眾、軍、公、教人員及一般低收入者的生活利益，儘可能設法加以照顧，以誘導人民能夠樂意適應於伴隨經濟發展必然到來的一個新的較高的生活水準（Standard of Living）而不致有太大的恐慌和痛感。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大眾生活利益與社會安定及文化拓新，都有密切關係。加以，顯然是有意的，選擇於農曆春節後三日（甲寅年正月初四，即六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並要「依規定程序立即分別實施」。蓋因這個時期，一方面，物價漲風，形勢上可說似已於「年前」粗告一段落；而他方，農曆「過年」仍然是全國同胞最開眼愉快的佳節，商店什九停業，買賣少，所加於物價的波動不會太大。在現代經濟市場上，心理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各國政府處理行政或金融重大事件時的慣技。這樣，無形中可以減少人民對於新功令可能發生的阻力。因此，插句題外的話：假如我們當對日抗戰勝利還都之際，能夠頒布有一道類似這「措施方案」的更廣大的經濟文憲來穩住當時物價，安定民心，則中共匪幫且將不可能有竊據大陸的意外機會！

當然，天下很少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對於「措施方案」自也不免有些足以使人誤解的地方。

首先，在標題裏有「措施」二字，似不免會使人發生這是一種「臨時」或「暫行」的感覺；而且還含有若干緊急性的暗示。因為習慣上常有「緊急措施」或「緊急命令」等詞句。論語子路：「野哉由也！……則民無所措手足。」這是關於討論「正名」問題，子路對答失態，孔子責他粗野……（不贊成「正名」、「興禮樂」）……則人民的不安於生，連手足都沒有地方可以放置。又「措」只可與「廢」字連用。「仁者將求之天下，措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墨子節葬）。某立法委員並曾以「所謂『一次性』、『一次調整價格』如何解釋？」向蔣院長提出質詢。其實，這都不過是修辭問題，無關宏旨。實際上，這一重大的「措施方案」，說明是基於四個原則而制定的。這四個基本原則是：（一）鞏固經濟發展的基礎；（二）保持國家財政的健全；（三）照顧大眾生活的利益；（四）增進軍公教人員的福利。這是「方案」中所訂一切「措施」的基準。試觀劈頭第一個原則，必須要「鞏固經濟發展的基礎」，既曰「鞏固」又稱「發展」，而未了指明是「基礎」，足見用意深遠，步驟嚴緊，則其後在實施細部上或行政技術上或不免有斟酌變通的可能，但大本已立，標的鮮明，所謂「措施」，所謂「一次性」等等，自都不應越出「因應當前經濟難局的一項總體性的計劃」之外。所以「像物價、利率和公用事業費率的調整」，都不「分段實行，或個別處理」，以免「引起每次衝擊，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這應該是中樞當局公忠報國，老謀深算的苦衷。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於「措施方案」公布剛滿一個月的二月二十六日，在立法院作口頭施政報告時，有一段話很足以增加我們對這「方案」的瞭解。他說：

「我們願意重申，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着力重點，是以加速農村建設和輔導中小企業為安定社會的基礎；以推動重、化工業和九項建設為進入開發國家的道路；以繼續拓展對外貿易和加強國際合作為強化經濟活力的必要手段；以調和社會大眾經濟利益和縮短貧富差距為基本着眼；而在穩定中求經濟發展，使其成果由全民共享作為我們努力的最終目標。」（上文所引第一個原則和下列若干單句，都同見「

口頭報告」。

### 三、經濟建設邁向新形態

天佑中華！希望我這個大膽的窺測幸而言中。

這將是一個微妙的、可喜的轉變。同時，不少留心經濟動態的人也都有一種感覺。這真如孔子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謹按這裡所說的「君子」、「小人」，不是指人的流品而言，而是指在朝的人和野的人，也就是指的政府首長們和全國人民）。意思正是說政府的「措施」好像「風」，人民的活動好像「草」；政府決定一道有德性的政策張諸國門，好像一陣和風吹過人民頭上，人民沒有不照着去做的。是以所說「偃」者，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負責任的政府以「德」化民，則有德性的人民沒有不像「草」一般隨風順從的。宋璟「德風邊草偃」的詩句，就可借作描寫這種施政的情勢。

這也就是說，基於上節所述，這個「措施方案」的頒行，假如足以讓我們看得出我們的經濟建設型態確已在轉變的話，那末，這一個微妙可喜的轉變，實在是百分之百的好轉變！

無可諱言，我國近一二十年來染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繁榮，實質上只是無數小市民、農民、工人、中小企業者，並包括軍、公、教人員長期付出大量血汗和苦楚所換來的成果！另一人數很少的所謂「大企業家」、工商領袖和金融鉅子們，固然也各有他們的寶貴貢獻；但，不客套的說，他們大都是平步青雲，因人成事而絲毫沒有什麼真實的犧牲。假如我們現有這樣的經濟發展，也要把它歸入科學上某種型態的話，毫無疑義是非歸入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不可的。他們對於社會大眾和苦難同胞，雖不時也有什麼捐贈、慰問之類的象徵性的福利或施捨，但若與他們本身所謂現代化的或超美式的高所得和有意無意在廣大社會底層所散播的毒素和禍根，是無法作任何比擬的！個人每念及我們的國家社會，隱伏有這種黯淡的潛因，就不免會從心底泛起詩經所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保第五章）和「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正月第十二章）的一股悽愴情懷！因而我乃能多少諒解有些同胞受了本能的

衝動，扶老携幼，擠向某國領事館簽發簽證；這又正如詩經魏風碩鼠篇：「碩鼠碩鼠，無食我麥！……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第二章）的那種無奈的呼號！

好！自蔣院長於前月杪發布了這一道經濟憲章（「措施方案」），情況已開始轉變了！無論廟堂山野，街談巷議，對於這「措施方案」，絕不會聽到有什麼反對的聲音。

爲什麼？還是用蔣院長自己非常堅定負責的話來解答吧。因爲這個「方案」是基於「一項總體性的計劃」，「以照顧大眾生活爲主要着眼」；因爲要「保持物價在一個新的水平上的穩定」而「用財政和經濟的合理手段來調和大眾的經濟利益」；因爲「今天政府所要做的，……是爲民衆謀福利而做的，也更是爲民族的綿延不息而做的」；因爲「我們的政府是屬於全體民衆的，就必爲全民服務，這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諦」；因爲「民主主義的社會建設，是要締造一個均富、安和、樂利的社會……」。

是的。蔣院長最近在立法院口頭報告施政方針時所強調「民主主義的社會建設，是要締造一個均富、安和、樂利的社會」的主張，本也是執政黨若干年來所揭櫫的「資本大眾化，分配社會化與消費合理化」的一貫政策。誠以經濟問題，必須用經濟方法處理。這次我國市場因受世界性資源、貨幣等多元影響，以至物價早晚不同，直線蹣跚，實已有岌岌可危之勢。若不及時挽救抑止，則經濟逆流的外射幅度，將會迅速擴大而釀成政治和社會的危機！「措施方案」適時頒布並「立即實施」，迄今不到兩個月，各方情況顯已漸趨安定而正在自行回復，互相自動適應的能力，以形成全民一個新的生活水準。此中契機，勢如閃電，轉危爲安，豈非大可慶幸！

#### 四、「社會經濟的改革應從組織合作社起」

現在我們應進而作較爲具體的討論了。

是的。方針既定，做起來，照理是不應該有什麼辦不到的。內政部不早已訂有「強化消費合作組織貫徹『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實施要點草案」呈候行政院裁核了嗎？報載行政院蔣院長對強化消費合作組織，供應日用必需品以照顧大眾生活利益的工作，繼續極爲重視，並已指示內政部

應加速推動，切實辦理。臺灣省政府也曾於上（二）月十五日召開社政工作座談會，全省社工人員均奉急電漏夜趕到參加。可見各方面對於此事的反應都很熱烈。在臺灣，合作事業本是全部歸內政部主管的。可是由於「措施方案」關於強化消費合作組織的問題，諸如組織體系，物資供應，資金融通及監督輔導等等。與財政、經濟兩部最有密切而重要的牽涉。如果把「措施方案」比作「經濟憲章」——根本法，那末，上舉各事就都非訂有妥善的施行專法不可。因此，內政部必須就各相關業務事先分別與財政部、經濟部及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等切實商議，取得協調，以通力合作的坦誠精神，達成行政院多角性的「措施方案」所涉及的重大事項。

因為合作事業是 國父所手訂的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而為通往國民革命終極目標的必由之路！

是以這一次關於推行「措施方案」的成功或失敗，對合作運動的前途和改善民生的仁政，都有莫大的關聯。成則民生主義可藉以加速實現，並可進而參加國際合作運動，共為人類謀幸福；敗則合作事業在臺灣，勢將一蹶不振而成為歷史的名詞，為世人所耻笑。這不光是一人一國的榮辱攸關，而將是為我中華民族對同胞，對世界的信譽和文化精神的嚴重考驗。

況且在近代人類行為中，「民主」與「合作」兩項建制，驟然看去，都似很庸俗而平常；但若認真去實行，則二者都須具有宗教信仰的崇高精神和公爾忘私，重義輕利的高度修養。試看世界民主作風的式微及合作聲勢的落寞，就可證明斯言之不謬。而消費合作社又可說是各種合作組織中最難辦的一種。早在三十多年前，蔣總統就曾對我們提出過警告。茲敬摘述要旨以作此後從事合作工作同志的準循：「講到我們要整頓一般公務人員和民衆的生活，我以為最有有效的辦法就是創辦合作社」。：：：「外國社會經濟的改革無不從組織合作社作起的」。：：：不過「大家在過去總以為用合作的方式來改善我們的生活，嫌其太瑣碎，而且有很多困難」。雖然如此，但大家知道，總統是一向恪遵 國父遺教，極其重視合作的。因而他仍很強調的指出：「這完全是我們畏難苟安的心理。如果能切實遵辦，必可發生最大的效果！」（見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黨部擴大總理紀念週訓詞）我們知道，在大陸時候，合作運動與合作事業都蓬

蓬勃勃的相當發達，就是由於 總統和中央黨部擘畫領導所促成。到臺灣後，當日本戰敗投降之餘，百業蕭條，民生窮困，我政府全心致力於寶島的復興，以奠定反攻復國的基地，因乃一面研訂經濟建設計劃，分期實施，一面獎勵僑外投資，振興工業及對外貿易，於是就覺沒有多少餘力足以照顧「合作」，幾使「主義」「國策」都被淡忘！行政院蔣院長冥思默運，目光如炬，深知惟有合作組織最足以消弭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隔閡於無形，發揮互惠過分利潤的功效以達於民生安和的理想社會，遂毅然決然的有強化消費合作社的登高之呼。自今以往，無論政府首長也好，消費大眾也好，我們必須屢及劍及，全力以赴，務使我們的經建型態納入於 國父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軌範之中，然後我們庶能完成光復大陸，復興中華的歷史使命！

##### 五、那末，消費合作社應怎樣強化？

「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元曲玉壺春這十四個字早已成為全國人人皆知的俗語：「開門七件事」。實則，就現代生活來說，這「七件事」合起來只是成爲一件：「食」。古人的生活簡單，以「食」爲最重要，故有「民以食爲天」的說法。文明愈進步，食的需要量愈減少。直至於今，人生「食」的比額，不過佔全部生活費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衣食、住、行、教育、衛生、醫藥以至旅遊、娛樂等等每一項一次的耗費，都可能超過了一月或一年的食糧價格。而且正確因此，現代人類工作的產品越來越繁多，越複雜，優劣貴賤，真假利害越難辨別，致使作爲經濟生活主體的「消費者」，對於物產品質及市場情形竟陷於茫茫無所知的半白癡狀態而予號稱「生產者」的工商分子以可乘的牟利良機。從事於工商的分子，因業務較爲機動，消息靈，見識廣，頭腦亦較爲靈敏，於是面對消費者成爲優越階級，駭駭乎對消費大眾有日益欺陵之勢，而消費者即或明知一二而莫奈他何！雖在昔賢中不知是那一位像管仲之類的法政大家，似乎是有意的把「工」、「商」列於「士」、「農」之下，以表示阿Q式的報復，使我們自古以來都有「賤商」的傳統觀念，但在實質生活方面，幾千年來，吃大虧，受剝削，而孤、弱、無援的畢竟是作爲「消費者」的我們。

尤其是自科技盛興，產業發達，工商巨子個個都成了面團團的資產階級或資本家，與鳩形鵠面，開門還不易解決「七件事」的勞苦農工及一般消費者之間，終於成了對立，使社會結構失去均衡與安樂。

這是人類自本世紀初旬年代以來迭遭空前戰亂浩劫的基因。而很顯然的，任何一國社會經濟的嚴重畸形（diformité），都足以招致國際關係的莫大惡化。這證明政治基於經濟，而國計繫於民生！「措施方案」的可喜在此；蔣院長的遠見亦在此。

效對於強化消費合作社問題的管見略陳於後：  
所謂「強化」，是對現有消費合作社予以加強而言。

全國現有消費合作社共約二千五百個左右，除機關、學校、農會及社區的組織外，地方性的消費合作社一百一十六個，社員一十七萬五千零五十一人；縣市合作社聯社二十個，省市合作社聯社兩個。這些社都已具有完整的組織系統。所惜管理欠佳，業務不振，主要原因無非是財、才兩缺。對於這偌大數目，並已具相當架構的消費合作社應儘先切實調查整理，去蕪存菁，再就人事及管理上加以短期嚴格訓練，從新積極指導，比較上易於見效。此其一。

機關、學校的消費合作社都是附設於所屬之機關、學校的。社員現成。業務幾乎完全可以預估。照理是不難辦好的。果能辦好，則對於生員生活利益及健康、規律都很有幫助。但往往因機、校中少數不肖的執事人員相機插入「濕手」去團麵粉，所售食用物品，物既不美而價反多貴於攤販或小商店。這是無論如何，主管機關都應急加整頓，無待贅言的。此其二。

社區消費合作社並未遍設，有待倡導。但現有鄉鎮農會三百二十八個單位，會員近二百萬人，對於農戶所需肥料、飼料、農具及日常食用必需品等關係極為重要，急應設法使全部農會參加各該縣市合作社聯社為法人社員，以與「全聯社」取得聯繫，為各所屬農民大量批購農作和家常必需品以資分配。這是在農村全面推行消費合作社的重要環節，應儘先促其實現。此其三。

上文所提及的「全聯社」為現有「中華民國合作社聯合社」的簡稱。這是全國合作社的中心組織，自應擔負起對全國消費合作社向廠商選購物

品，並洽由出品廠商就近將物品逕向單位合作社運送，以求簡捷。全聯社等於是全國消費合作社所需物品的供銷處或總批發社。這當然需要鉅額資金，有非各單位消費社所能彙集。關於此點，筆者竊願在這裡非常懇摯地寄望行政院蔣院長提示財政當局及有關金融機關特別注意，設法予以優惠融通，以潤滑這初期民生社團新機器的運轉，而圓滿達成我中樞當局苦心經營的偉大政策！至於此項融通的資金，應用何方式撥付，或設立「消費合作基金」，或作為政府的「提倡股」，或為有利長期貸款，屆時由全聯社與金融機關酌情商定，似可不必拘於一格。此其四。

至於新設的消費合作社，必須先從重點着手。例如臺北、基隆、臺中、臺南、高雄等省轄市儘先籌設，然後視地方情形，向各縣轄市推進增設，在近期內，千萬不宜責成農村普遍設立，以免欲速不達之患！但凡省、縣轄市消費合作社所需日用品，應由上文所述之全聯社統籌協調，負責供應，以一事權而增強績效。此其五。

又上文所言「重點」，包含兩種意義：一為區域性的重點，即指全聯社及各省、市轄消費合作社而言；二為業務性的重點，社中所擔承分配的物品種類，務宜集中少數項目，慢慢地視環境需要，逐漸增加，以免人力財力的分散與浪費。此其六。

全聯社總、副經理，初期應由主管機關慎選聘用，以合作經濟人才而有實務經驗的年輕人為主。省市社理監事人數宜少不宜多，並應嚴定當選的資格。政府撥有「合作基金」或參加「提倡股」的消費合作社，其所選理監事至少應佔全部四分之三。此其七。

對於消費合作社以外的他種合作組織，主管機關也應同時予以強化和酌加組設。其中如農產運銷、農村信用、農產保險或加工等項，並宜先後輔導籌組，以期可與消費合作社及運銷系統謀取配合，使業務易臻發達。祇有工業生產合作，似非俟全國消費、保險、信用等合作社辦理著有成效後，不宜輕於嘗試，以免力分勢弱，難於奏效。此其八。

總之，合作事業原來就是一種奇妙的，同時也是很技巧的「沒有商人的商業」（Le commerce sans commerçant）。理想固然很高：廢除利潤，產銷合一。但在營運和管理各方面，可說是採用「以子（指商

人)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在技術競賽及服務精神上,幾乎與一般商業是完全沒有區別的。所以目的固「是為民衆謀福利而做的,也更為民族的綿延不息而做的」(參閱前面(三))。但是做起來,也正如前面總統所詔不免會「嫌其太瑣碎,而且有很多困難」。可是這一次,我們硬非一道同風,突破困難以底於成不可。

## 六、「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我們大家只須同心協力，遵循「措施方案」所樹立的縱橫路標分途並進，則消費合作組織體系所發揮的實際功能，必將會順理成章的把我國帶入於三民主義經濟建設的康莊大道。我們這次因物價問題所引起的短暫騷動，一方固由於受了國際驚濤所震盪；但同時，更直接而富有破壞性的原因，實為有很多不法商人私爾忘公的「趁火打劫」！不是嗎？自春節以至日前的婦女節——三月八日，臺北街頭的人潮，真是肩磨踵接，水洩不通，而各大公司和中、小商店所陳疊的百貨，祇有「堆積如山」四字可資形容。可見春節前那種恐慌搶購的情況，正合於凱恩斯揭發個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矛盾時所說「饒饒中的貧困」(Poverty in Plenty)。他並主張世人誠欲拯救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實有賴於政府的干涉。因為自由放任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是肇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種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的思想而來的。結果，勢將變成產品獨佔及財富集中於少數私人之手，形成貧富日益懸殊，使消費者大眾被「日進萬金」的所謂「大企業家」和無數大小不肖商人從中剝削不可。

國父說：「思想者何？即公共心。」(「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又說：「……舊思想總是妨礙進步的，總是束縛人羣的。我們要求人民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現在橫在我們面前的障礙是什麼呢？毫無容疑是日益擴大並深度化的貧富差距和運銷系統的古老陳腐，轉折太多，不能善盡「貨暢其流」的社會責任。前者是由於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關係過於疏遠與隔閡所造成；後者即是中、小盤批發商和零售小商人的過於繁衍，而他們這些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乃至小姊妹們不但不知「服務」為何物，自更

談不到應盡所謂「分配」的社會責任！差得遠！差得太遠！我們的經濟結構中既然存在有上面這兩種大瑕疵——而最嚴重的還是後者這些老幼婦孺在污濁「社溝」(註)中所沾染的病態思想(公共心)，實為民生社會的隱患！——那末，對症良藥自莫過於可小可大，公正和平的合作組織了。主要理由可如下述：

(註)：「社溝」這個名詞是筆者仿照「代溝」所杜撰的。請參閱三月

二日中國時報拙文「合作組織是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一)筆者堅信，「民主」與「合作」是近代人類所發明最重要、最進步的兩大思想。凡是民主程度高的國家，合作事業多很發達。(共產極權的「集體」，當然不是「合作」。)反之，合作不行，即民主政治亦多落後。我們的民權主義政治就是最完善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是必然要有地方自治作為基層建制的。國父手訂「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以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即「消費合作」)、銀行合作(即「信用合作」)及保險合作「設局經營」為先決條件，就可充分證明「民主」與「合作」實有先天的聯體關係。

(二)至於「合作」之與「民生」，更是互相表裏，有如難兄難弟，相得益彰之概。總統在「總理遺教六講第二講」裡曾說：「因為現代政治惟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國民衆人人能知禮知義，足食足衣。換言之，就是「民生樂利，萬物得所」。所以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必須努力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最重要最有效果的一個方法，就是普遍推行合作制度，發展合作事業。」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在七次大會中，又說：「改進合作事業以健全社會經濟；對農業生產、運輸、消費等合作，尤應積極推行」。

(三)中華建國，以地方自治為基礎，而縣為地方自治的單位。申言之，「縣」就無異為「國」的縮影。何況在理論上，「合作」是發於人民的自動而重在自下而上的。所以「今日合作事業之推行，必須求其普遍，更須求其確實。……然迄今之較有基礎者，僅為農村信用合作與都市消費合作之組織，……至於生產與運銷合作之組織，益復寥若晨星，更無以實現總理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教訓，更不能達成增進國力，充裕民生之目的」。這是早在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總統在大陸時，以「今日合

作事業推行之方針」為題對於國人的訓誡。現在我們合作事業的主管及各  
地同胞，應如何急起直追，以充實自治基礎而增進國家實力，以仰副  
總統久年的期望！

四、中華文化自古以德行為重心。「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如所周知，合作社是  
以「人」為本位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社團。商人則往往相反：徹頭徹  
尾的以「錢」為本位而以營利為目的，也就是孔子所說他們是德德以德行  
為「末」，為「外行」，而以賺錢牟利為心中惟一的目的。這不就是「合  
作者」與「商人」的分野嗎？工商業者惟利是圖，一味互相爭奪，利己害  
人，（「爭民」是與人民爭鬪，「施奪」就是施行搶奪）社會又怎麼能夠  
安和？總統所以很強調的指出「合作事業之特質，在以平等互助通力合  
作之精神，與和平奮鬥自力更生之手段，團結力量，改造社會，以建立一  
種新的社會經濟體系，始與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建設之理想完全一致。  
」（「三民主義的社會經濟建設與合作事業」）

故此，一個國家和人民，特別是遭逢危難風險的時候，尤其必須以道  
義為利益而不可以財貨為利益。這叫做「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 七、「合作」，「民生」與「文化」的統合

——哈！沒有錯吧？當你和我聊起你要定下這樣廣大的一個題目為某  
雜誌構想一篇文章時，我就覺得你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什麼？我的老毛病？難道你以為我真的是要做一個「立法委員」。  
好！的「老立法委員」不成？……

——你扯的什麼？我不懂。什麼「立法委員。好！」「好立法委員好」  
的？這話，教誰聽了都會莫名其妙！

——你才莫名其妙咧！我說。這是民國三十八年秋，我從香港來臺觀  
見總統，並賀王亮囑先生生日。王先生一見到我，劈頭就說：「你來啦  
。立法委員。好！」我答他說：「是！我有什麼不好？」王說：「我是說  
你立法委員『好』呀！你們到會，拿錢；不到會，也拿錢；說話，不負責  
任；不說話，也不負責任！立法委員還不好嗎？」於是，相與大笑，他即

拉我入席「乾杯」。這話忽忽已二十多年。王亮老早已作古。言念及此，  
不勝愴然！「山外層層挹翠空。湖樓十月正多風。暮陽無限蕭蕭意。都付  
秋雲晚磬中！」我還要無端引出這首清季通人李慈銘「獨遊湖上晚歸」的  
詩給你聽。我想你一定更會莫名其妙呢？

（註）王亮老的生日是農曆十月初十。他逝世後，王夫人素信天主，  
修道益堅。

——管什麼詩不詩的。我總覺得你這個題目天真而空洞，且看你如何  
交卷？

——這倒是真的。我實在是很想趁着蔣院長頒布這一道空前的「一切  
以安定民生為主，一切以民眾福利為先」的「經濟憲章」的良機，希望大  
家全心全力以消費合作組織來推行民生主義經濟，而共圖宏揚文化，不但  
「為了一時的政治利害，而為的是中華民族千秋萬載之福，更是為全人類  
的自由趨吉避凶」。至於究竟天真不天真，空洞不空洞，我也顧不了那麼  
多啦。

——好吧。那你就幹你的罷。我等著拜讀。再見！

☆☆☆☆

剛才蔣院長在上述施政（口頭）報告裡，不是提到「人類的自由」嗎  
？「自由」？嗨！這問題可才真大啊！在我國，自古很少有把自由二字連  
用的；至多或偶見諸詩篇，如杜工部「送客逢春可自由」之句。但這「自  
由」二字亦仍然不過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禮中庸）或「大臣舉措  
，恣心自在」（漢書王嘉傳）等一種主觀性的自我滿意的表達而已。可是  
在西方文化裡却大大不同。遠在雅典亞里斯多德以來，中經英倫的「不流  
血革命」和巴黎的「大流血的大革命」，以迄百來年前法國所製贈，矗立  
於美國紐約港口中，海拔九十三公尺，用作大燈塔以「照耀世界的自由神  
」（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和我們當前的反共鬪爭這漫  
長期間，無數巨哲碩學和烈士英雄為着辯論自由和爭取自由所流的血淚和  
墨水，有非血滯骨嶽所可形容。尤其我們今天在臺灣，正是面對共匪為爭  
生存，爭自由而戰，所以更非加速穩定經濟，振奮人心，以建立三民主義

模範省作爲反攻復國的基地不可。

「自由」的範圍非常廣大。一般分爲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法律自由及宗教自由等。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是關於經濟方面的自由。自十八世紀下半年後，在法國個人自由放任主義(Liberalisme)者群中，很多優越的經濟和社會思想家。他們主張政府除國防、司法和教育及某些公用事業以外，對人民的經濟活動不應橫加干涉。正統經濟學的老祖師英國亞丹·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是於一七六四年辭去當時英國最佳大學之一——格拉斯哥大學的教席，受蒲克婁公爵(Duke of Buccleugh)的聘請隨往歐陸，於一七六六年返英。在這三年中，他留法國的時間幾乎佔了一半；並曾往日內瓦住過兩個月，與福爾泰迭有往還。他對這位法國哲人及文藝復興的先驅極致崇敬。他的不朽巨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本早已於一七七三年就完成了的。但遲至一七七六年始見出版。後來研究史密斯思想的人，認爲他在思想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格大所講授的Lectures on Justice, Revenue and Arms。牛津，一八九六年出版。可是「國富論」中若干意見，在他未旅行法國以前，以及他和若干法國經濟、社會思想家互相過從以後的思想狀態，顯有不同。

史密斯的著作生氣栩栩，情趣盎然，喜歡以眼前事實作滋養而富有文學價值。他旅法漫遊，不待說，充分吸收了法國社會的自由氣氛，足以影響他原有的思路。

而，如上所述，法國本土素來就是一座思想自由的寶塔。經濟方面，例如蓋士雷(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丟爾古(Turgot A. R. J. 1727—1781)等及英年早逝的巴士典(Bastiat C. F. 1801—1850)，都是自由主義的創立人，而以後者——英年早逝的巴士典最爲突出。他們不但提出了「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任其自爲！任其自往！」)的箴言，他們並昌言在蚩蚩者氓，雜亂無章的經濟行爲的相互關係中，有一隻「不可見的手」在牽引着一般只知自利的商人們紛紛走向公益的路而終於會無意中達成了社會的和諧。

論性格，他們是樂觀主義者。

他們對自由具有絕對的信心。當時若有人稱他們爲「正統派」或「古典派」，他們一概拒不接受，而只自稱爲是「自由派」。他們雖也不很看重「結社主義」如「合作主義」、「互助主義」及「工團主義」等，以爲是空中樓閣。然而他們所全力倡導的「自由主義」這一股強風所吹茁壯大起來的又是什麼呢？

「資本主義」和它的副產品「共產主義」！

自由競爭爲各民族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溝」，而後者則以階級鬭爭爲全人類建築成功了悽惶殘酷的地獄！是啊！他們也曾說過「有時是經過災禍而到了利益」，而巴士典則硬是明說，祇須「各人各照着他自己的利益去做，而結果則各人於不自知不自願之中，都係在爲大眾的利益服務」。 (註)這真是盲目的樂觀和痴心的妄想。而，僅僅在一個世紀以後，他們所認爲是「空中樓閣」的「合作主義」，卻已真實實在的在很多國度裡一批批，一幢幢，非常堅固繁榮的豎立起來了。他們所過慮的「災禍」固已「不幸而言中」，而所冥想的「利益」則成爲渺茫的幻景。這真是當時才學俊博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所未能想像的呀！

(註)見拙譯「經濟思想史」卷三第五三四頁。

是以，時至今日而顯爲人類謀幸福，天真的自由主義既已證明失敗，而殘暴的共產主義又事事都要迫使人類退回到原始的野蠻(註)，那末，我國父三民主義所倡導的合作事業自應及時興起，爲漸已誤入斷潢絕港的人類解除危機而登斯民於衽席。我們要繼續努力發展經濟以求「富」，但也必須同時遂行合作組織以求「均」。資本主義時代過去了！民生主義時代必然來臨。而合作組織則爲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爲什麼？因爲合作無論在政治上——特別是對於地方自治——或經濟上，都是一股強大的凝聚力。我們曾說「縣是國中國」。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合作是家上家」。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正是我們黃帝子孫立身處世的大道理、大目標嗎？古今中外，政治做法不外霸道與王道兩途。前者重現實，後者重理想；前者勢必爭奪，後者在求和平。國父說：「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其目的本在和平。」(這話出處，一時沒有查清) 總統民國五十七年青年



節告全國青年書會說：「我國固有文化的精義，簡言之，就是一個『仁』字。」對啊！「仁」以人二人。人絕對不可能一個個分開來孤立生存而必須合作。合作必須二人以上以至無數千、萬、億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合作的本質也「就是一個『仁』字，……而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實為其具體的表現。」而合作組織則又為民生經濟的實施辦法。

（註）這是 總統遠在對日抗戰前某次紀念週上說的：「共產黨是用現代的組織來施行原始的野蠻。」年月已記不清。

☆ ☆ ☆ ☆

或以為合作社的功能固屬溫和可靠而沒有毒害，但當今科技萬能，一切都應注重效率和速度，故認為合作對於我國正在急遽發展中的經濟建設，怕有迫不及待之勢，在目前未必相宜。否！否！絕對不然。於此姑只恭引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的幾句 遺教以作這冗長文章的結語：

「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新發明叫做合作社……現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由於這種合作社之發生，便消滅了許多商店，所以從前視這種合作社為不重要的商店，現在便看作極有效力的組織。」——「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決。這種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國有，第三直接徵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完）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於經思樓



### 景印四部善本叢刊

王雲五博士 主編

本書就四部善本精選，全書七十冊，整部售價一萬三千五百元，各種零售價如下：

宋刊本	詩本義	三冊	八一〇元
宋刊本	春秋公羊疏	二冊	三三〇元
蒙古刊本	重校三體圖	四冊	八四〇元
宋刊本	說文解字	五冊	一、〇二〇元
宋刊本	編年通載	四冊	九三〇元
宋刊本	太宗皇帝實錄殘本	四冊	九三〇元
宋刊本	那齋讀書志	八冊	一、七一〇元
永樂大典本	水經注	八冊	一、三二〇元
宋刊本	武經七書	三冊	六〇〇元
宋刊本	南華真經	五冊	一、〇八〇元
宋刊本	演義露	三冊	五一〇元
宋刊本	樂善錄	三冊	六九〇元
宋刊本	謝幼槃文集	二冊	四二〇元
宋刊本	乖崖先生文集	四冊	七五〇元
宋刊本	山谷外集詩注	八冊	二、二五〇元
明洪武本	密庵稿	四冊	八一〇元

###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